

未下手拿捕之先。如有所闻，先求即赐一电，使仪暂时来鄂，或以电知会湖北之驻沪坐探员，从权收留仪于一处，以避在沪逆党之凶锋，俾留此残躯，他日以报该逆欺累之仇，并绝其死灰复燃之累也。

康有仪的告密函还附有维新派往来之信函，和入京运动通行姓名名单，要梁鼎芬通过张之洞秘密办理，否则，他担心杀身之祸会从天而降。其作贼心虚、诚惶诚恐之状已跃然纸上。

康有仪的这封告密函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维新党人对武装斗争的重视。

除此之外，康有仪《致节公先生函》还揭示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史料。如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出游桂林，再寓风洞，并组织了传播维新思想的圣学会。关于康氏与广西省官僚之间的关系，密札中亦有表露，略谓：

丙申腊月，（康有为）游说于桂林，阴结唐薇卿，托开学会，同为运动。唐氏在生时，伪保皇会每年助其万金，康逆屡使人在京为其运动出山之计，去年又向京中要人，代其营钻团练大臣之职，奉（旨）斥责，今且死矣。又尝试史抚多所干求，史抚厌之，值其来拜，则托病以挡，康逆至今恨之，故其各私报阻其出山。

上文中唐薇卿是指唐景崧，组织广西圣学会出力最著。史抚则指广西巡抚史念祖。康有为在百日维新的上书中，对史念

祖颇多微词，参阅康有仪之密札，即很容易找到答案。

再如，密札中多次提到，康有仪将康有为与哥老会联络的信札寄给两广总督岑春煊查办，并以其子同和作为人质，以求岑春煊出面严办。虽一禀再禀，岑氏始终没予理睬。这对研究维新派在海外与岑春煊的关系，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康有仪在密函中称：“该逆少年曾有语云：与名誉之人相交，有甚于毒蛇猛兽，信然。”这对于了解康有为之性格，也会有所帮助。另外，烈侠梁铁君为了执行康有为暗杀慈禧的使命，“纵翼遂飞去，三度入帝乡”，“身探虎豹穴，手挽蛟龙藏”。但是，突然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被人告发，事泄被捕，最后被袁世凯鸩杀于狱中。梁铁君之案是何人告密，至今还是一个谜。而康有仪的《致节公先生函》的发现，似乎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因为该密札曾多处提到铁君，并将他写给康有为的关于同哥老会联系的信件，也作为铁证送到梁鼎芬手里，这是否为清廷提拱了日后抓梁铁君的线索，也很值得注意。

（选自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

历史的细节

茅海建

1998年，当我结束两次鸦片战争的研究进入到戊戌变法之领域时，准备花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来完成此项研究。以我过去的个人经验来推断，用10年的时间，来研究1年的政治事件，是大体可以完成的。现在看来，我那时还真小看了此课题研究的难度，忽略了此课题研究的特点，心中的期许也被迫一改再改。由彼及此，13年的时光就像飞云一般地飘了过去，然而我的研究终点，现在还看不到头。

我自以为还不算太懒，之所以工期会一拖再拖，大体有两个原因：其一，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留下的史料中作伪，使得有心治此史的学者处于两难的境地，既不能回避不用，又不能轻易采信，而不得不花费精力去一一鉴证。其中一部相当重要的史料——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真真假假，难以分辨，等到我实在绕不开时，只得下决心做一个彻底了断，结果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为之作注。其二，戊戌变法中的许多细节面目不清，影响到其整体或局部的“史实重建”，也影响到对前后历史因果关系的把握与理解。然若要将之一一考证清楚，却

又是相当的费工费料，吃力而不一定讨好。这几乎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力气活。

在宏观的历史叙述中，细节经常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如此这般的直接结果是，历史被叙述为运动方向明确的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潮流。由此引发的直接思考是，戊戌变法若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事件，其结局似不应如此。连续 13 年的观察使我感到，戊戌变法很可能是一偶发的事件，其发生、发展到最后的结局，充满着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很可能就存在于那些历史的细节之中。而从更宽泛的研究视野来看，细节的意义也在最近十余年的历史研究中得以彰显——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

从长时段来观察历史，可以看到历史的某种规定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时时伴随着多样性和偶然性，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似只存在于长时段之中，历史的偶然似由细节所致。毫无疑问，戊戌变法是一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然其时间又极为短暂，跌宕起伏，大升大降。千钧一发之机，婉转曲折之密，似又皆藏于细节之中，有待于后来者去感受与发现。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并非所有的历史细节都需要考察，历史的空白常常表现为必须，无须去填满，方显其自然。但对戊戌变法来说，若不由历史细节入手，反复精思缜量，似不能识其大，见其全，以解读其中的真原因，以感受其中的真意义。这恰是我在进入该项研究之前尚未充分注意到的该课题研究的特殊性。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细节的考据，虽说是有价值的，也经常是令人兴奋的，但长久在此踱步或蹒跚，却又是相当疲惫的。对读者来说，恐怕更是如此。当《戊戌变法史事考》于2005年初出版时，有一位我敬重的长者打电话给我，善意地提醒道，“考据不是目的”。我自然深明此理，历史学家的目光似不应长期聚焦在细节的观察上，小学毕竟是小，锱铢或引人厌；但又自以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细节若不加以清晰化，似还不能也不太敢去描述一些大场景，解释一些大问题。我不由地继续留在此处，又工作了许多年。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交稿之际，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进度，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完成手中的细节考据工作，而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

但愿那阳光能早一点照射到我的身上。

还需说明的是，本书内容多为考证，引用当时的文献较多，为了避免日期转换之不便，本书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重要处夹注公元；而1912年（民国元年）之后仍用公元。本书对各位先贤或研究先进，皆直呼其名，非有不敬之意，以为省文。由于我的研究过程小有弯曲，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中略有展示。这是两种体例的研究和叙述各有其所需所致，也是不同的读者或不同的阅读空间各有其所需所致。

本书所研究的内容，思考与写作的时间都很漫长。应当感谢的机构与人士，即便列出一长名单，恐怕也会有所遗漏。因此，我在此仅向以下两类人士表示谢意与歉意，且不开列其名：其一是我的学生，我因诸务甚多而平时对他们关照不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时常为我寻找材料或核对文稿；其二是我在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服务时的各位同事与领导，我称不上是一个性格完美的人，但他们对我的一些毛病，仁慈地都予以宽容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月11日）

戊戌变法的另面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自序

茅海建

史料的发现真是让人惊心动魄，在我研究戊戌变法已达十年之后，阅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不由又有了牖开思进之感受。

很长时间以来，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以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为基础，构建成当前戊戌变法史的基本观点、述事结构和大众认识。尽管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康、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但毕竟没有新的大量的史料可供其另辟新途。历史学家陈寅恪言及戊戌变法的思想源流，称言：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